

古人的千秋藏书梦

/ 周铁钧

中国藏书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,从秦汉王室的文库、石室,到唐宋明清朝廷的书楼、文阁,都是国家级藏书机构。历史上朝代更迭必是烽火硝烟,征服者纵然不乏文化人,但他们首要目的是夺取政权,哪有闲暇顾及那些蒙尘的竹筒、泛黄的纸页。于是,一朝朝官府藏书楼阁或焚于战火、或失于动乱,如镇江文宗阁、扬州文汇阁、南京文澜阁、登封嵩阳书楼,等等。

黑蝴蝶般飘舞的古书灰烬,催生出一大批立志延续国学、传承典籍的藏书家,从南北朝起,出现了私人建造的藏书楼,到唐宋开始有私人书院。如五代杨悛所创的应天书院、唐代陈与建立的松州书院、罗简创建的梧桐书院等,这些书院除“子弟弱冠,皆令就学”外,都“聚书万卷,以资学者”。

除了书院、书楼藏书外,民间不乏大批痴书的藏家。明代富商朱大韶藏有宋版书万余册,有一次

他见到一本古锦玉签的宋版《后汉书》,愿以万金买下。但藏主并不缺钱,要换朱家里一名美貌的婢女,朱大韶欣然允诺。不料那美婢听说要拿自己换书,连夜逃跑了。朱大韶因没得到《后汉书》郁郁成疾,不久竟撒手人世,成了藏家中“以命殉书”的佳话。宋代知州胡应麟藏书成癖,所得月俸全部用于买旧书,不够就用妻子的发簪耳环抵充,再不够当场把穿的衣服脱下换钱。《绘事微言》中记载胡应麟藏书:“饥以当食,渴以当饮,尽毁其家以为万卷书。”

不论藏家“以命殉书”还是以书“饥当食”,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可怕又无法抗拒的难题:自己死后这万卷藏书谁来管理?还能不能传承下去?如明代万历十七年南京进士焦竑,他平生醉心藏书,建造了澹园藏书楼,面积350多平方米,有藏书4万余卷,代表着明代南京私家藏书的最高水准,在全国极具名望。但焦竑的后人都不热衷藏书,没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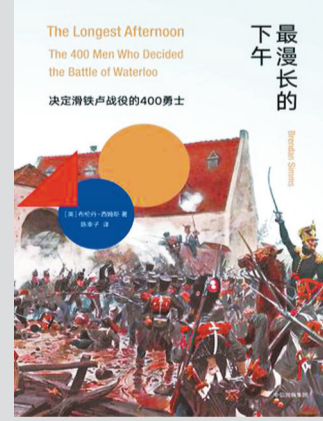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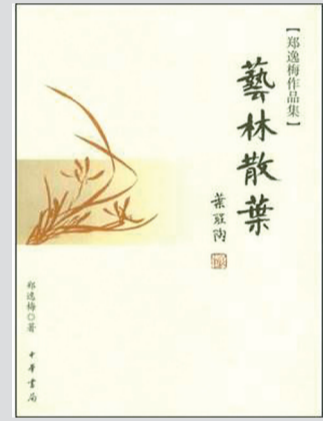
去继承他的收藏遗愿,澹园书楼的藏书在焦竑去世20余年后便散失殆尽。

宁波天一阁藏书楼是幸运的。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四十年(1561年),创建人范钦27岁中进士,先后在湖南、江西、河南等地做官,55岁升为兵部右侍郎。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宦宦生涯,为他藏书提供了方便条件,每到一地做官,他都细心搜集各类古籍,尤重地方志、科举录、政书等当代典籍,所藏书籍达7万多卷。范钦生命走到尽头后,他的大儿子范大冲用田地租金养护藏书楼,范家藏书接力就这样开始了。100多年后,“接力棒”传到范钦的曾孙范友仲手上时,天一阁藏书依然完好无缺。直到新中国成立,天一阁仍保存藏书13000多卷。

藏浩如烟海的古本典籍流传至今,每一部都融汇着古人的千秋藏书梦,他们不懈的精神激励着现代读书人、藏书人演绎、递接、传承他们的努力、执着和希望。

本版电邮

zhbookworm_123@163.com



读郑逸梅

/ 王家年

郑逸梅(1895—1992),出生于苏州,祖籍歙县,鸳鸯蝴蝶派作家,南社社员,后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。以擅写补白文章闻名于海内外,素有“补白大王”之誉。1980年代初,笔者曾去郑老上海长寿路寓所的书斋“纸张铜瓶室”拜访,此书斋名他用了80年。

《郑逸梅经典文集》,分《芸编指痕》《前尘旧梦》《艺林旧事》《艺林散叶》《世说人语》五册,是郑老笔记体文章一次难得的整理集合,不少内容是香港《大成》杂志提供,从厚厚的五大册中,得以更全面地领略这位文坛耆宿深厚的功力。

《文集》所载文章,时间跨度为晚清至民国,内容涉及领域极为宽广,宫廷内情、市井奇闻、名人佚事,从他撰写的文史掌故中可深入了解那个风云变幻年代的社会状况。社会名流和名人生活是郑老笔下的“重头戏”,仅《艺林散叶》一册“知人篇”中,郑老以补白的形式写人的条目就多达6244条,行文精炼,却能将每个人物的举止性情刻画得入木三分。“知人篇”中有的篇幅短到仅数字行,画龙点睛,令人惊叹。

郑老博闻强记,一生笔耕不辍,在他98岁临终的那天上午,老人还完成了《画家潘天寿》的几千字长文,被公认为我国写作时间最长的作家。与他感情甚笃的孙女郑有慧曾回忆道:“祖父写作的速度非常快,一天要写两三千字,有时要四五千,而且他记忆力非常好”;“他写人物和人家不一样,他一定要对这个人非常熟悉,如果这个人不是很熟悉,他不光要看资料,还一定要到这人的家里去。”故而,读郑老的文章,似乎是在你面前娓娓道来,他的记载多为所见所闻之亲历,其中更不乏其他书籍中难以寻觅到的史料。

从《艺林旧事》“投军趣事”一文中,获知,杭州灵隐寺的老方丈曾经是上海龙华寺的僧人,俗姓萧希能,身躯伟岸,为推翻满清政府,毅然脱了袈裟投军,与郑老一同上过战场。这位大和尚因脚大无比而只能套着一双僧鞋操演,读来忍俊不禁。“毁于战火的东方图书馆”一文,描述这个全国藏书量最大、由商务印书馆建成的图书馆毁于日寇的炮火,令读者深感痛惜与愤怒。《艺林散叶》中,当时众多艺坛大家名人的论学为人之道更是跃然于纸上。郑老之文,为研究现代文化史、文学史留下了宝贵史料。

因信仰而战

/ 何小美

我们总是对规模宏大或战略意义重大的战争付诸于更多的关注,就好像提到拿破仑,总会想到滑铁卢战役,这从当时的欧洲局势甚至世界历史发展方向来看,没有任何问题,但对战争中某个个体而言,可能完全是另一种看法。英国知名历史学家布伦丹·西姆斯在新书《最漫长的下午》中展示了拉海圣庄园保卫战,在英王德意志军团这400名勇士眼中,拉海圣庄园保卫战就比滑铁卢战役更具有现实意义。

《最漫长的下午》叙述的是英王德意志军团第2轻步兵营在位于盟军阵线中央位置的拉海圣庄园进行的英勇防御。作者没有按照战争类书籍惯用的时间顺序来叙事描写,而是从战争亲历者的大量信件、回忆录和评论中一一精心撷取相关的内容,从部队编制、武器状况、战斗进程等方面对每一个人的战斗姿态、每一个人的选择取舍进行细致描述,力图还原战场上的真实情景。除战役本身之外,书中还对战后那些老将,如奥普抵达和巴林的动向进行了分析,既增加了叙述的完整性,更满足了读者的探知欲望。

在不少战争题材作品中,对战斗的描述经常非人性化,将士兵们描述成仅仅是棋子。在《最漫长的下午》中,个体在面临对敌时的紧张、惶恐、零星的愚蠢错误,都被西姆斯描绘透彻,虽不那么完美,却让人感觉更真实生动。面对法军的无情杀戮,400名英王德意志军团勇士硬是凭借着“共同反对法国的霸权,用战斗赢得自由胜利”的意志,在只有一间马厩、一个猪圈、一座谷仓、一座农舍、一道围墙、一汪池塘的拉海圣庄园实现了坚守,为盟军等待援军出现并在滑铁卢战役给予拿破仑致命一击,赢得了战机。他们不是战争中任人摆布的棋子,他们有自己的坚守,有自己的目标,他们被低估却左右了战局。

人偶

/ 阿龙

我去东南亚国家,常常对那些木偶怀有兴趣,虽然很少动过要带一个回来的念头。那些木偶的制作实在是太过诡异,总担心到了夜晚它们便会控制住你的思想。



中国的提线木偶,或者皮影人物,以及这几年一种在市场上流行的关节会动的人偶,就做工而言,丝毫不亚于东南亚之下,甚至可以说精致出许多,但就是觉得没有生命,或者说那个生命与人的现实是平行于两个世界的,就算挂在家里也就是一个装饰,难得让人在夜晚发出莫名奇妙的想象,自然也不会有惊悚的效果。往深里细究,总觉得这种工艺一定还是少了点什么。

我几年前曾买过驴皮制作的皮影人物“刘关张”,对着它们看了

半天,也没看成“他们”。后来就在我扔房间昏晃里了。这几年过去,也没见它们在夜里出来透透气。

好像日本人对人偶看得特别重,一只做工精良的人偶可以传上好几代,有的成了文物级,价格不菲。那种人偶脸煞白煞白,也不知和主人家是如何和谐相处。或许对人偶怀有足够的敬意,是保证互不相犯的基本前提?

说起人偶制作,传说中最有名的大约就是法国人罗真。他首先是位哲学家,通过炼金术活了数千年以上,身上汇聚了一股神秘的“邪能量”,所以他做出来的人偶都管他叫“爸爸”。罗真喜欢跟自己做出来的人偶说话,告诉它们一定要给它们真正的生命,哪怕再等上百年上千年。我相信这是人偶师的一个魔咒,你得先相信它们真的会有生命,制作的时候那些人偶才会获得暗示,从而增添克服自身局限的信心,争取来人世闯荡。

某些电影拿人偶来做悬疑的引信,这也是有道理的。我在瑞士一个商场就看过一个娃娃,第一眼觉得趣致,后来怎么看怎么觉得适合做鬼片主角儿。当然,这类过于诡异的人偶置在家里确实挑战人的神经。民间有一说,万一不幸得到了这样的东西西闹得家里不得安宁,正确的处置方法是,先在它身上撒把盐,然后再放火烧了——也不知灵不灵?没准儿那人偶就顺势在火中永生。

“门生”之变

/ 廖华玲

“得意门生”是一种荣耀。然而在历史长河里,“门生”词意的变化很大,有时根本不能用“得意”搭配。

“门生”是我国古代标明人的一种特定身份的专用词。早在春秋就有“门人”的称呼。孔子聚徒讲学,无论是亲授业者,还是转相传授者,一律称为“门人”。《论语》中先后八次出现“门人”。到战国,寄食于贵族门下的食客也被称为“门人”。这些食客才能出众,肝胆侠义,属于“士”阶层。西汉初,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,秦末战争爆发,讲学授业和寄食游说都受到极大打击,因而在文献中有关“门人”的记载很难找到踪影。

彼得·海尔说:“历史是一出没有结局的戏。每一个结局都是这出戏的新情节的开始。”“门人”消失了,“门生”却在东汉大量出现。欧阳修在《集古录跋尾·后汉孔宙碑阴题名》中,曾这样定义:“亲授业者为弟子,转相传授者为门生。”可见,“门生”作为再传弟子,即弟子的弟子,在当时已是对特定身份的人一种专用称呼了。

当这个称呼意味着权力意味着升官发财,东汉的“门生”就失去了纯洁性。一些并不以学问相师承的钻营投机者,也想设法为自己戴上“门生”的帽子,四处奔走,极力讨好有权势的人。因而那些毫无学问可言的权宦官也有了“门生”,这种“门生”就是权贵的打手、走狗。为攀权附贵,这些“门生”在主子死后还争相为之立碑颂扬功德,把自己姓名也刻在碑上以抬高身价。喜好铭文碑刻研究的欧阳修发现,东汉权贵们的碑石绝大部分都是“门生”所立。此风延续,影响深远,到魏晋南北朝,在重门第的大环境下,只有当上士族权贵的“门生”,才可以得到升官的小小机会,同门之下动辄“门生千余人”竞争。

隋唐后,科举制兴起,“门生”含义发生新变化。科举主考官被称为“座主”;及第者,就称为“座主”的“门生”。伴随着“座主”与“门生”这种特殊的密切个人关系,往往形成派系之争,甚至发展成与中央专制集权相对抗的政治势力。但既然科举制是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好办法,这种关系就难以禁止。于是,宋、元、明、清,“座主”与“门生”这种特殊关系保持了下來。

科举制实行后,从传道授业方面讲,师承关系上仍沿用“门生”的称呼。一个学问家有许多“门生”,比如南宋朱熹有名可查的“门生”就达54人之多。师者,不仅仅授学问,还要传自己的价值观、思想观。《宋元学案》记载:“欧阳中立……上书言新法不便,以司马温公门下坐。”显然欧阳中立和其师司马光一样反对新法,因而受到王安石打击。明代东林党人设书院讲学,提倡“经世致用”,“门生”与“师长”一起探讨治国之道,形成一个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。清代,“门生”与“师长”的关系就是师承授受的学问关系,不与政治沾边,这可能与避免文字狱有关。

餐桌上的蔬菜

/ 李波

人们的一日三餐离不开粮食,也离不开蔬菜。但在八大菜系上百种经典菜品里,用蔬菜命名的却少之又少,比如鲁菜奶汤蒲菜、烧二冬、拔丝山药、云片猴头菇、油爆鱼芹,川菜麻婆豆腐、四川泡菜,粤菜鼎湖上素等。

餐桌上蔬菜的种类包括了叶菜类、根菜类、茎菜类、菌类,有20多个科,十字花科、茄科、伞形科、菊科、百合科、藜科、豆科等。

上古,“炎帝始草木之滋,察其寒、温、平、热之性,辨其君、臣、佐、使之义,尝一日而遇七十毒,神而化之,遂作文书上以疗民族,而医道自此始矣。”

公元前2400年,华夏祖先黄帝提出“五谷为养,五果为助,五畜为益,五菜为充,气味合而服之,以补精益气”。“五菜”就是葵、藿、薤、葱、韭,还进一步阐述为“葵甘,韭酸,藿咸,薤苦,葱辛”。古人已初步了解植物中含有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,对体内器官组织具有不同功效,因而可以对症食疗、食补强身。

在种植蔬菜方面,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罐子中,就有较为集中的十字花科芸薹属种子,意味着在距今8000年前,祖先已开始种植白菜、青菜、芥菜等。《山海经·北山经》记载“又北百一十里,曰边春之山,多葱、葵、韭、桃、李”。《诗经》描述了

大约20多种蔬菜。《汉乐府》里唱到“春谷持作饭,采葵持作羹”。战国策·韩策》中称“民之所食,大抵豆饭藿羹”。《齐民要术》记录了葵的种植过程。汉代《四民月令》中有“二月别小葱,六月别大葱,七月可种大、小葱”的栽种经验。

蔬菜的种植和食用带动了文学作品的产生,其中“葵”最突出。“葵”被古人视为“百菜之主”,现代人把它归为锦葵科,民间称为冬苋菜或滑菜。不过,明以后,葵菜逐渐离开餐桌,汪曾祺说是因为“后来全国普遍种植了大白菜。大白菜取代了葵”。但上古祖先已食用白菜,时称“菘”,葵和菘几乎是同时代产物,那么,为什么葵被菘取代呢?

夏商时期,烹饪以煮、蒸、烤为主,无论是菘还是葵,烹饪出来的味道没有区别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民间烹饪除煮、蒸、烤外,煎、炸、炒、炖、煨、烩、熬以及腊、醃、泡等技巧不断涌现,菘不仅能在煎、烩、炒后保持枝叶的形状,脆、嫩、爽的口感也很突出,还可被腌制成咸菜储存。与菘相比,葵只能充当时令蔬菜,适用范围大打折扣。于是唐代起,人们的餐桌上常常摆放的是菘,韩愈描述“晚菘西切肥牛肚,新笋初尝嫩马蹄”,刘禹锡也有“只恐鸣驺催上道,不容待得晚菘尝”,苏东坡更有“白菘似羔豚,冒土出熊罴”之盛誉。